



Reconstruction of Body Discourse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After Theory”: Terry Eagleton and the Significant Turn of Western Literary

Wang Xiaohua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Western cultural theoretical study has entered into a relative sterile period which is labeled “After Theory” by Terry Eagleton. In his view, the phrase “After Theory” does not mean that theory is now over, and that we can return to an age of pre-theoretical innocence. On the contrary, if theory means a reasonable systematic reflection on our guiding assumptions, it remains as indispensable as ever. What he wants to emphasize is that current theorists have lost the ability to reflect upon the life world.

Eagleton contends that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why theoretical study encounters crisis is the amnesia of the authentic body and the real life. For those who are still dominated by the dichotomy of mind/matter, the body is a fashionable topic, a submissive object, and even a corpse. As a result, the initiative and creativity of body has been repressed and concealed by the mainstream production mode. Reinforced by the Deconstructionists, this mode leads to a “new semantics” which treats body as something that can be controlled, disintegrated and used. Along with the aggravation of this tendency, the aesthetic taste of body becomes more and more morbid: apart from the thing imposed on it, the body-object can only show its menial parts and attribute, such as desire. Placed on the center of literature and arts, its integrity and dignity has been lost.

As a result, the body in the theoretical field has been deformed. Led to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humanity and life world, this mode renders the theoretical study to be a rootless language game. Terry Eagleton finds this symptom, regards the subjective body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end of theoretical study, tries to reconstruct the image of body-subject, and restores the relation of theory and life world. By the endeavor of more than thirty years, he has accomplished three interconnected tasks: Firstly, he points out that the oblivion of creative body has cut of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ory and the origin, and the huge shadow generated by it lies between the scholar and text. Secondly, he emphasizes that the oblivion is rooted in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it reflects the logic of domination which camouflages itself elaborately. Finally, he demonstrates the possible path of returning to the body-subject. By means of the mediation on these three levels, Eagleton offer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clue that we can take body as a starting point and promote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a journey back home. In the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this i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which has not been evaluated sufficiently. For the Chinese scholars, who are looking for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this “fresh thinking” and novel research program may be enlightening.

Keywords: After Theory; body discourse; subject; fragmentary; production mode

Author: Wang Xiaohua earned his bachelor's degree, master's degree and PhD in Literature from Jilin University, Fudan University and Nanjing University respectively. Currently professor in College of Art at Shenzhen University, Dr. Wang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studies of literary theory, aesthetics and cultural criticism, with representative works including *Depression and Expectation: the Deep Structure of Cao Yu's Drama*; *Philosophy of Individual*; *Eco-criticism*; *Between Modern and Post-modern*.

身體話語重建與“理論之後”的理論研究

——伊格爾頓與西方文論的重要轉向

王曉華



[摘要]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西方世界對文學、文藝理論的研究進入到相對沉寂時期。面對這種間歇狀態，英國學者伊格爾頓用“理論之後”這個術語表達了不滿。在他看來，理論危機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當代學者將“身體”變成了一個時髦的話題，忽略了它最積極的一面，甚至使它不斷淪落為“屍體”。由於佔主流地位的文化生產模式依舊延續精神/物質的二分法，把身體當作管制、切割、解剖、規訓、爭奪的對象，身體的主動性和創造力被壓抑和遮蔽。解構主義的流行更強化了這種傾向，身體被統攝、分解、利用，難以展示自己的全貌。隨着這種態勢

的發展，有關身體的審美趣味也日趨病態：被視為客體的身體除了強加於它的東西外，被展示的多半是些卑微的部位和屬性（如慾望）。儘管它被置於文學、文藝的中心地帶，但卻喪失了它的完整性和尊嚴。這直接導致了人們對人性和生活世界的誤解，使得理論研究退化為無根的語言遊戲。伊格爾頓發現了其局限，通過借鑒馬克思的思想與現象學的身體觀念，將“身體—主體”定位為理論研究的出發點和歸宿，以重建身體的主體形貌，恢復理論與生活世界的聯繫。經過數十年的梳理，伊格爾頓完成了三個相輔相成的工作：一是指出主流文化對“身體—主體”的遺忘切斷了理論與本源的聯繫，由此產生的巨大陰影橫互在學者和文本之間；二是強調這種遺忘源於勞動分工所造就的精神/物質二分法，反映了被精心偽裝的統治邏輯；三是演繹了理論建構回歸“身體—主體”的可能路徑。通過這三個層面的思考，他敞開了一條重要的理論綫索——人們完全可以既從“身體—主體”出發，又不重蹈自然主義、生理主義、感覺經驗主義、機械唯物主義的覆轍，推動理論研究走上歸家之旅。在西方學術界，這是迄今為止仍未獲得充分估價的貢獻；對於正在尋找理論創新路徑的中國學者來說，可能會具有某種啓迪意義。

[關鍵詞]理論之後 身體話語 主體 殘缺 生產模式

[作者簡介]王曉華，先後在吉林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獲得文學學士、文學碩士、文學博士學位，現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主要從事文學理論、美學、文化批評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壓抑與憧憬——曹禺戲劇的深層結構》、《個體哲學》、《生態批評》、《在現代和後現代之間》等。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西方世界對文學、文藝理論的研究進入到相對沉寂時期：包括羅蘭·巴特（R. Barthes, 1915—1980）、拉康（J. Lacan, 1901—1981）、福柯（M. Foucault, 1926—1984）、阿爾都塞（L. P. Althusser, 1918—1990）、德勒茲（G. L. R. Deleuze, 1925—1995）、布迪厄（P. Bourdieu, 1930—2002）在內的大師紛紛離世，剩下的領軍人物也喪失了原有的“雄心和原創性”。^①在新的學術地平綫還沒有清晰成形的過渡狀態中，英國學者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因之推出了專著《理論之後》（*After Theory*, 2003）。此後，作為一個被頻繁使用的術語，“理論之後”成為當代人文學術中最熱門的表述之一。然而，不少研究者忽略了作者在該書開篇的話：“沒有理論，就沒有反省的人生。就此而言，我們永遠不可能處於‘理論之後’。”^②顯然，“理論之後”是個意味深長的表述：人類需要理論，但卻被迫處於“理論之後”，因此，從事文論研究的學者必須踏上重建理論的道路。那麼，究竟應該如何重建理論呢？其實，他在1990年出版的《審美意識形態》中已經給出了思路：“看來，唯一富有成效的策略是回到起源並重新思考一切，但這次是從身體自己的觀點出發。”^③在寫作《理論之後》時，這個觀點又不斷被提及：

說道德基本是一種生物學事務，這等於說，如同與我們有關的其他事情一樣，它最終根植於身體之中。……物質身體延伸於時間和空間之中，是我們與同物種的其他成員所共用的最重要的東西。^④

對於熟悉伊格爾頓的人來說，這種“身體轉向”頗為費解：自踏入學術領域以後，他一直致力於剖析、批評、諷刺、超越西方主流文化，而“身體”本是備受福柯、德勒茲等人關注的寵兒，因此，回到“身體話語”豈不是意味着妥協？儘管伊格爾頓擅長反諷，並時常在嚴肅的論戰中插科打諢，但這次決非戲言：除了《審美意識形態》以外，他的《後現代主義的幻象》（1996）、《甜蜜的暴力：悲劇的觀念》（2003）、《理論之後》（2003）、《馬克思為什麼是對的？》（2011）構成了完整的系列，展示了他對身體話語的連續思考。作為造詣深厚的左翼文化批評家，伊格爾頓既熟諳馬克思（K. H. Marx, 1818—1883）對感性、生活、實踐的強調，又關注梅洛-龐蒂（M. Merleau-Ponty, 1908—1961）探究身體主動性的知覺現象學；他眼中的“身體”不是主流文化津津樂道的客體（玩偶、傀儡、屍體），而是創造歷史的“勞動主體”（subject of labor）；從這種積極的“身體”概念出發，伊格爾頓試圖清點西方文論的舊傷和流弊，推動“理論之後”的理論研究回到其起源和承擔者。

一、“殘缺的身體”與理論對生活的疏遠：一個重要的邏輯綫索

綜觀伊格爾頓的著述譜系，人們會發現他並沒有建構出連貫的“身體學”（somatics）體系，因為他本質上是批評家而非哲學家，他對“身體”範疇的運用隸屬於其批評事業。要理解他的身體思想，就不能不把握其總體批評立場。

對於伊格爾頓來說，1976年是個重要的起點。正是在這一年，三十三歲的他出版了《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和《批評與意識形態》兩書，引起了學術界的反響，奠定了他在左翼批評界的地位。此時，身為大學講師的他深受馬克思、本雅明（W. Benjamin, 1892—1940）、布萊希特（B. Brecht, 1898—1956）的影響，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藝術觀：“我們可以將文學當作文本，但同樣可以把它看作一種社會行動，一種與其他形式並存和聯繫的社會生產和經濟生產。”^⑤“藝術部分地是社會的上層建築”，“部分地是社會意識形態，是社會知覺複雜結構的構成元素……”^⑥在《批評與意識形態》中，他提出了“生產的一般模式”（General Mode of Production）：“一種生產

①④ 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3), 1, 155.

②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Press, 2004), 223.

③ Terry Eagleton,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0), 196.

⑤⑥ Terry Eagleton, *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66, 5.

模式可以稱為物質生產中特定力量和社會關係的統一體。每種社會形態都包含此類生產模式，其中之一佔統治地位。”^①特定時代的文學生產往往既包含數種模式，又組建出“不對稱的整體”：佔統治地位的“文學生產模式”（Literary Mode of Production）會強迫其他模式位居次要層面，甚至部分地排斥它們。涉及身體時，佔統治地位的生產模式依然起支配作用。那麼，與身體相關的主流生產模式具有什麼特徵呢？在《審美意識形態》導言中，伊格爾頓意味深長地說：

本書不斷關注的一個主題是身體，它與上述問題具有某種關聯。事實上，我在某種程度上傾向於為這個主題的時髦辯護：今天，很少有文本能符合新歷史主義的準則，除非它至少包含一個被弄得殘缺的身體。^②

此處的“時髦”，顯然對應着佔統治地位的文學生產模式。後者把身體推向了中心，卻祇青睞其“殘缺”形象：20世紀80年代起，逐漸興起的新歷史主義強調從政治權力、意識形態、文化控制的角度解讀作品，分析身體時也傾向於展現其被壓抑、分割、宰製後的形態。

如此吊詭的安排顯然不乏荒誕意味。那麼，“殘缺”的最根本特徵是什麼？發源於1982年的新歷史主義為何偏愛“殘缺”的身體？對於這些問題，他並未在《審美意識形態》中給出答案：這本專著祇有最後兩章探討當代思潮，但運筆至此的伊格爾頓已不再聚焦於“身體的話語”。當然，綫索並沒有中斷，身體更沒有失蹤，他需要時間來梳理當代思想中的身體觀。在1996年出版的《後現代主義的幻象》中，“殘缺”一詞有了清晰的所指：

的確，從巴赫金到美體商舖，從利奧塔（Lyotard）到“緊身衣”（leotards），身體變成了後現代思想當下最為關注的東西。被弄傷的部位，被折磨的軀幹，被裝飾或者被囚禁的身體，被規訓的和有慾望的身體：書店裏充斥着諸如此類的東西，值得我們追問為什麼。^③伊格爾頓在此巧妙地利用了兩個名詞（“利奧塔”、“緊身衣”）之間的相似性，藉以戲諷當代西方文化的體觀：儘管諸位大哲生產出了複雜的詞語體系，但都沒有改變對身體的客體定位。受此影響，主流文化把身體當作管制、切割、解剖、規訓、爭奪的對象。於是，身體變得殘缺了：它被統攝、分解、利用，難以展示自己的全貌。隨着這種態勢的發展，有關身體的審美趣味也日趨病態：由於視身體為客體，主流文學（文化）常常聚焦於它如何被“被拔毛、刺穿、銘刻、擊打、充氣、收縮、重鑄”。^④作為客體，它似乎與任何主動的規劃無關。除了被強加於它的東西外，它被展示的多半是些卑微的部位和屬性（譬如慾望）：“代替蘋果一樣豐滿的詩，我們現在有了像腋窩般物質的文本。”^⑤“在文化專業的學生中，身體絕對是個時髦的話題，但通常是色情的身體而非飢餓的身體。人們感興趣的是交歡的人體而非勞作的身體。”^⑥於是，身體進入了主流文學，被置於中心地帶，但卻喪失了自己的完整性和尊嚴。

那麼，誰應該為身體的“殘缺”負責呢？不是新歷史主義，因為它沒有自己獨立的身體觀：“新歷史主義不過是福柯的註腳。”^⑦此時，伊格爾頓劍指福柯：作為後現代主義陣營中聲名顯赫的人物，他的身體學影響深遠。^⑧福柯思想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挖掘身體的客體性：通過撰寫《規訓與懲罰》等名著，他重構了西方文化規訓、監禁、懲罰身體的歷史和機製，試圖從身體中發現、把握、揭示權力運作的秘密。在這個過程中，他發現啟蒙運動之後的身體處於被監禁狀態：

福柯顛倒了“靈魂居住在身體的監獄中”這一存在的新柏拉圖主義、諾斯替、基督教教條。或者至少是，他說啟蒙運動顛倒了這種關係。自啟蒙運動以來，相反的情況纔是真實的，因為如今是身體被監禁在靈魂的監獄中。靈魂通過理性的控制，通過對身體的制度化的規訓和持續的監視，更加以科學上合法化了的壓制實踐，在身體上施加了巨大的力量，使他

① Terry Eagleton, *Criticism & Ideology*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6), 45.

② Terry Eagleton,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s*, 7.

③⑦⑧ Terry Eagleton, *The Illusion of Postmodernis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6), 66, 67, 66.

④⑥ 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164, 2.

⑤ [英]特里·伊格爾頓：《歷史中的政治、哲學、愛慾》（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馬海良譯，第205頁。

變得柔韌和順從。身體是由靈魂的沖動塑造的，那些沖動是壓迫性的。^①

與動輒實施酷刑的專制時代相比，啟蒙運動以後的身體懲罰無疑溫和得多，但福柯眼中的身體仍被監禁在“靈魂的監獄”裏，依舊是權力實施統治的對象。權力規訓、改造、塑形，身體則為權力的運作提供場所，服從是其唯一的美德。到了近代，這種美德成為“機器”（人體機器）的特性。隨着對機器的控制日益複雜，“一種對人體的各種因素和行為的精心操縱”也誕生了。“人體正在進入一種探究它、打碎它和重新編排它的權力機制”，受制於紛繁複雜的紀律和法規。^②圍繞着對身體的管制，現代社會發展出了一整套權力技術，軍營、監獄、工廠、精神病醫院、學校都是馴化身體的場所。權力機制的具體樣式可能發生變化，但身體的被支配地位卻不會發生改變。它屬於對象的系列，顯現為肉體—武器、肉體—機器、肉體—工具、肉體—紋章、肉體—樣板等。不难看出，雖然相關分析細緻而不乏獨到之處，卻始終未能克服一個欠缺——總是將身體界定為絕對的客體，很少提及身體的抵抗。正因為如此，福柯的研究推動了文化研究向“作為客體的身體”（body as object）的位移。^③

從福柯入手，伊格爾頓開始對“新身體學”（the new somatics）進行全面反思：“對於這種新的身體學，任何舊的身體都沒有用。如果說力比多的身體要進來，勞動的身體就必須出局。有許多殘缺不缺的身體，卻絕少營養不良的身體。”^④以慾望的身體替代勞動的身體，展示“殘缺”的身體卻忽略忍受飢餓的身體：這是一種偏執的定位，本身就是對身體的切割和遮蔽。借助微妙的轉換，被動的、瑣屑的、世俗的身體就為後現代主義提供了佐證：“作為一種頑固的局部現象，身體完全符合對宏大敘事的後現代質疑，以及實用主義對具體事物的愛戀。由於我不用羅盤就在特定時刻知道我的左腳在哪兒，所以，身體提供了一種比當下備受苛責的啟蒙理性更親密和內在的認知模式。”^⑤於是，各路批評家紛紛從“理性”的過時寶座轉移到“身體”之側，尋找可茲利用的資源。不過，他們越是以偏執而片面的方式關注身體，身體就越是被遮蔽和傷害。當這種傾向被推到極端，身體就會被等同於屍體：“人們或許會期待新的身體學的興起，在其中，身體將成為新的理論主角。毫無疑問，文學批評中的身體很快將比滑鐵盧戰場上的更多。”^⑥恰如滑鐵盧戰役上被殺死的身體，當代文學批評中的身體常常淪落為屍體：“‘身體’一詞帶給思想的首批意象之一就是一具屍體，這是笛卡爾主義傳統所造成的破壞的一部分。聲稱圖書館裏有一個身體，絕非暗指這是一個勤奮的讀者。”^⑦

流行的文化研究使“身體”成為一個時髦的話題，卻忽略了它最積極的一面，甚至使它不斷淪落為屍體。如果身體是人們在世的一種方式，那麼，對身體的誤解就必然牽連出對生活的誤解。這造就了理論與生活之疏遠：理論“隔”在批評者與作品之間，其龐大的身影遮蔽了真實的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說，“理論之後”實為“理論之蝕”。為了籌劃更富有生產力的理論模式，處於“間歇”狀態的學術界應該清理輕視身體的主流觀念。

二、佔統治地位的文化生產模式與身體被壓抑—遮蔽的深層機制

身體的真實身份被遮蔽，不過是一種表層徵候。重要的是發現其背後的基本機制。對於伊格爾頓來說，這正是他樂於承擔而且最為擅長的工作：他並非“職業哲學家”，無意於在形而上學層面有所建樹，更喜歡扮演醫生的角色，通過分析身體話語來診治當代文化研究中存在的病症。

在文化史上，範疇時常結對出現：靈魂/身體、理性/感性、文化/自然，等等。對身體的不信任伴隨着對超身體事物的信仰：相對於短暫、可朽、脆弱的身體，靈魂似乎可以寄託人們對永恆和完美的渴望。在身體被壓抑的過程中，靈魂等精神存在則登上了王位。那麼，二分法是

① [匈]阿格尼德·赫勒：《現代性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李瑞華譯，第219頁。

② [法]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劉北城、楊遠縷譯，第150頁。

③④⑤⑥⑦ Terry Eagleton, *The Illusion of Postmodernism*, 68, 67, 67, 22, 68.

如何誕生的？心與身之間為什麼出現了鴻溝？德國思想家馬克思曾從勞動分工的角度進行了分析：“從這時（指出現勞動分工——本文作者註）起，意識纔能想像自己多於被意識到的現存實踐，它因此可以真實地表現某種東西而不表現真實的東西；從這時起，意識纔佔據了這樣的位置，使自己從世界中解放出來，去構造‘純粹’的理論，如神學、哲學、道德，等等。”^①早在寫作《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時，伊格爾頓就沿着這個思路前行：“藝術是勞動分工的產物，社會發展到某個階段時，物質勞動與精神勞動分離，以致產生一批相對地脫離物質生產手段的藝術家與知識分子。文化本身是一種‘剩餘價值’……社會上的物質剩餘對其發展至為重要。”^②勞動分工是個功過參半的過程。它使社會結構超越了原始的狀態，但也直接催生出精神/物質、靈魂/肉體、理性/感性的二分法。佔統治地位的個體扮演精神、靈魂、理性的角色，必然聖化它們而貶抑物質、肉體、感性。凡是主動、高貴、美好的品性，都被賦予前者，後者則似乎永遠意味着惰性、低俗、混亂。在莎士比亞（W. Shakespeare, 1564—1616）的劇作中，李爾王（The King Lear）曾被當作掌控一切的魁首，一個國家的自我意識，一位萬能的精神主體。事實上，這些並非源於靈魂的本體論特性，而是龐大權力體系的支撐。正是由於後者的存在，國王纔似乎無所不在。通過分析《李爾王》，伊格爾頓再次揭示了靈魂神話的誕生機制。到了資本主義時期，支撐上述邏輯的社會體系不但依然存在，而且造就了新的異化現象：大機器生產所對應的精細化分工掏空了感性的豐富性，將身體縮減“粗鄙而簡單的需要”。^③於是，“粗鄙的慾望和‘非具身化’（disembodied）的理性之間出現了裂縫”^④，“身體”日益成為混亂、低級、簡陋的同義語，祇能等待來自精神存在的拯救。由此可見，勞動分工、等級制、統治的需要支配着意識形態的運行，衍生出一種貶抑身體的文化生產模式。

佔統治地位的文化生產模式總是在貶抑身體。對於身體來說，這似乎是一種“結構必然性”。不過，身體被貶低的邏輯既然源於等級制，那麼，解放身體的力量就必然存在於後者的對立物中。主流生產模式既非鐵板一塊，又不是靜止之物。到了文藝復興以後，新興的資產階級追求精神上的獨立、自由、民主。雖然等級制仍在起決定作用，但它已經被迫與自己的對手共處。進入啓蒙運動階段以後，這種趨勢變得更加明顯：一個人可能隨時展現出兩種面孔，兩個姿態，兩類人格。在分析美學誕生的因緣時，伊格爾頓提到了啓蒙運動的悖論：“由於在政治或經濟權力方面沒有根基，這次資產階級啓蒙運動在許多方面都把賭注壓在反對封建專制上，還保留着對權威的廣泛尊敬，譬如，康德既是勇氣十足的啓蒙思想家，又是普魯士國王溫順的臣民。”^⑤於是，“主體以激進民主的方式為自己立法，又認可來自上層的規則，置身於一個存在政治差別的世界。自由的承諾因此可以成為壓制性權力的對立面，也可能是與之同謀的誘惑性形態”^⑥。儘管存在諸如此類的局限，“解放”還是發生了：

在另一種意義上，這種謀劃源於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對野蠻的壓制性國家所取得的歷史性勝利。因此，它包含着對獨立主體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的烏托邦式的觀照。權力由中心化的機構轉向了主體沉默而不可見的深處；不過，這種位移也是廣泛的政治解放的一部分，在其中，自由和同情，想像和身體性感受，都極力使人們從壓制中聽到自由的聲音。^⑦

等級制規劃不再被當作不可懷疑的天道。當上與下的界定受到挑戰時，勞心與勞力、靈魂與身體、感性與理性的僵硬區分自然會暴露出其可疑之處。

正是在啓蒙運動造就的張力中，鮑姆嘉滕（A. G. Baumgarten, 1714—1762，也譯作“鮑姆嘉通”）於1750年出版了影響深遠的專著《美學》（*Aesthetica*），“美學”獲得了正式命名：“誕生於18世紀的陌生而全新的美學話語並不是對政治權威的挑戰，但可以理解為絕對權

① Karl Marx with Friedrich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8), 82.

② Terry Eagleton, *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 68.

③④⑤⑥⑦ Terry Eagleton,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s*, 199, 207, 15, 27, 27-28.

力出現內在困境的意識形態徵候。”^①由於等級制無法再像從前那樣自我合法化，一種“身體話語”纔最終浮出海面。當鮑姆嘉騰給美學下定義時，表面謙卑的言辭已經透露出抗爭的意志：“美學作為自由藝術的理論、低級認識論、美的思維的藝術和與理性類似的思維的藝術是感性認識的科學。”^②“低級”的感性竟然與“高級”的理性類似，這種說法本身就大有深意：相對於沃爾夫林（H. Wölfflin, 1864—1945）、邁埃爾（G. F. Meier, 1718—1777）等美學家“近似理性思維”的表述，“類似”這個微妙的措辭突出了感性的地位。它並非完全不同於理性的存在。在感性與理性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深淵，與理性“類似”的感性自有其價值。按照鮑姆嘉騰的分類，“低級認識能力”包括：（1）認識事物的一致性和差異性的低級能力；（2）感官的記憶力；（3）創造能力；（4）判斷力；（5）預想力；（6）命名力。^③其中，“感官的記憶力”無疑與身體具有不言自明的聯繫。正因為如此，美學的創立見證了“身體對理論暴政”的反叛：

“美學”是作為身體的話語而誕生的。在德國哲學家鮑姆嘉騰所做的最初表述中，這個術語首先指的不是藝術，而是如古希臘的“感性”一詞所指稱的那樣，是與人類全部感知覺的領域，它與與概念思維更加精妙的世界形成鮮明的對照。18世紀中葉，“審美的”這個術語原來強化的並不是藝術與生活的界限，而是物質與非物質之間的區別……它是樸素唯物主義的“首次萌動”（first stirring）——是身體對理論暴政長期的無言反叛的結果。^④

當然，此類萌動還停留於一種自我壓抑的形態：作為“低級認識論”，它還需要以理性為範本（鮑姆嘉騰稱邏輯學為美學的大姐），渴望在後者的統領下變得明晰。如果說鮑姆嘉騰“以革新的姿態”敞開了感性的領域，那麼，它又為理性的“殖民活動”打開了大門。^⑤對於身體而言，美學扮演著自我矛盾的角色：既代表著“真正解放性的力量”，又指向如霍克海默（M. M. Horkheimer, 1893—1973）所說的“內在的壓抑”——將社會權力更深地注入被征服的身體中，並因此作為一種最為有效的政治集權模式而起作用。^⑥

由於這種悖論品格，鮑姆嘉騰之後的西方美學和文化建構朝着兩個不同的道路發展：身體既得以展示自己的主體性，又不斷被迫退到客體的行列。對於主流美學來說，後者的影響更大。於是，對身體的壓抑、遮蔽、扭曲一直延續到20世紀。伊格爾頓目睹了新身體學的興起並發現了其局限，試圖消除當代理論的背反品格，開闢一條從“身體—主體”出發的理論通道。

三、回到“身體—主體”：“理論之後”的理論定位

透過伊格爾頓略顯隨意的論述，不難看出：他試圖完全從身體自己的立場出發，重塑身體的主體形貌。在實現這個理論籌劃時，他主要汲取了兩種思想資源：馬克思與現象學的身體觀念。

伊格爾頓之所以重視身體，首先因為有一個馬克思式的信念：人們很可能就是這個有生命的、感性的、勞動的肉身。青年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曾激情洋溢地寫道：“說人是肉體的、有生命的、現實的、感性的、充滿自然活力的對象性存在，等於說，他擁有現實的感性的客體作為自己存在或生命的對象，或者說，人祇有在現實的感性的客體中纔能表現自己的生命。”^⑦受益於這種肯定感性生命的立場，馬克思找到了重建理論的機緣：“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對歷史進行了徹底的重新思考，這一次是從身體開始的。”^⑧與同時代的大多數學者不同，馬克思通過“勞動的身體”啟動“重建”工程。^⑨“勞動的身體”之所以如此重要，在於這種說法揭示了身體的主體性：勞動是實踐的一種，實踐是“創造對象世界，作用於無機自然”的生命活動，承認了身體的勞動能力就等於承認它是生產的主體。^⑩通過諸如此類的

①④⑤⑥ Terry Eagleton,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s*, 15, 13, 14, 13.

②③ [德]鮑姆嘉騰：《美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7），簡明、王曉旭譯，第13、13頁註腳。

⑦ Karl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 of 1844* (Mineola &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2007), 156.

⑧⑨ Terry Eagleton,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s*, 198, 197.

⑩ Karl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 of 1844* (Mineola &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2007), 75.

分析，馬克思展示了理論研究回歸“身體—主體”的路徑。

不過，聚焦於宏觀社會實踐的馬克思未能充分展開自己思想的身體維度：“儘管身體非常重要，但馬克思、塗爾幹、齊美爾主要關注的還是現代工業社會。正因為如此，在他們的作品中，身體有時會變得朦朧，成為缺席的在場者。”^①要建構“身體話語”，就不能排斥其他思想資源，聚焦於生活世界的後期現象學對伊格爾頓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在論述自己的身體觀時，伊格爾頓高度評價了胡塞爾（E. E. Husserl, 1859—1938）的貢獻：“在《歐洲科學的危機》中，胡塞爾試圖將生活世界從它對於理性而言的令人不安模糊性中解放出來，並因此更新西方人的理性——曾經令人吃驚地與身體和感性之根割裂開來的理性。”^②對於他來說，後期胡塞爾敞開了這樣的事實：“在它（指哲學——本文作者注）開始思考之前，身體已經是感性地體驗着的有機體。它處於這個世界之中，絕非被放在盒子中的客體。”^③“體驗着的有機體”具有主動性，可以接觸和感知外部世界：“通過用手動覺地去觸摸，同樣地，通過用眼去看等等，我就感知到了，並且隨時都能夠進行這樣的感知……通過感知活動，我經驗到了一切自然，其中也包括我的身體，因而在其中，身體總已經向後回溯到自己。”^④由於這種積極品格，身體把握遭遇到的事物，感受和勾劃對象的輪廓，勘測人與環境的關係，參與空間世界的建構，並因而成為因果關係的交叉點。^⑤如此能動的身體，即便不是完全的主體，也具有不可忽略的主體性。胡塞爾的身體理論深刻地影響了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在《知覺現象學》等書中，這位現象學的傳人更加明確地承認身體的主體性：“身體能夠象徵生存，因為它實現它，是它的現實性。”^⑥根據對知覺的分析，梅洛-龐蒂將身體定位為“主體—客體”：“不解之謎就在於此，即我的身體同時既是能見的，又是所見的。身體注視着一切，也能注視自己，並在它當時所見之中，認出它的能見能力的‘另一邊’。”^⑦有時，他明確地將身體定義為“肉身主體”。^⑧這個觀念啟發了伊格爾頓，推動他建構以“身體—主體”為關鍵詞的理論研究綱領。提及梅洛-龐蒂時，他不乏讚美之辭：“《知覺現象學》是關於身體的最佳著作之一，其作者恰恰是法國左翼人士梅洛-龐蒂。正是由於現象學的影響，一些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纔投身於對活的經驗和日常生活的研究。”^⑨在他看來，梅洛-龐蒂的左翼身份昭示着現象學與當代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密切關係，意味着兩者相互影響的可能性。

事實上，伊格爾頓本人的理論建構就體現了綜合兩者的嘗試。在正面闡述自己的立場時，伊格爾頓反復強調其唯物主義立場：“物質身體是我們和我們物種的其他成員分享的最有意義的東西，它同時在時間和空間上延伸。”^⑩對他而言，“否定物種身體的意義而又同時又在字面意義上主張唯物主義”不符合邏輯。^⑪從唯物主義角度看，人就是身體。沒有身體，就沒有人。人的身體具有創造力：“人體由物質組成，但組成人體的這種物質的特別之處在於它具有獨特的創造性和表現力，而我們所稱的‘頭腦’，指的就是這種創造力。”^⑫進行思考的“頭腦”不過是身體的一部分。思想是身體的思想，身體是思想的擁有者。被傳統哲學聖化了的理性也“從身體中產生”。^⑬與傳說中的靈魂不同，能夠思想的身體是實踐的承擔者——移動石頭，操作機器，呼喚他人。勞動、權力的獲得，慾望的實現，都體現為身體的活動。實踐中的身體具有創造性，總是在主動改變周圍的事物：“人類身體的特殊之處就在於它的在改造周圍物體的過程中改造自

① Chris Shilling, *The Body in Culture, Technology & Socie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5), 16.

②③ Terry Eagleton,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s*, 17, 17-18.

④ [德]胡塞爾：《生活世界現象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倪梁康、張廷國譯，第158—159頁。

⑤ Edmund Husserl, *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9), second book, 67.

⑥ Maurice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109.

⑦ [法]莫里斯·梅洛-龐蒂：《眼與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楊大春譯，第129—130頁。

⑧ [法]莫里斯·梅洛-龐蒂：《哲學贊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楊大春譯，第151頁。

⑨⑩ 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32, 155.

⑪ Terry Eagleton, *The Sweet Violence: The Idea of the Tragic*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 xv.

⑫ [英]特里·伊格爾頓：《馬克思為什麼是對的》（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李楊、任文科、鄭義譯，第137頁。

⑬ [英]特里·伊格爾頓：《審美意識形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王傑、傅德根、麥永雄譯，第196頁。

己的能力。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它在邏輯上先於那些物體，是超越它們並在它們之上的一種‘剩餘’（surplus），而不是和它們並列的客體。但是，如果身體是一種自我改造的實踐，那麼它就不是以屍體或者地毯的方式與自己同一……”^①在改造世界的實踐中，身體根本無須“幽靈般的實體”推動：“人類身體與果醬罐和牙刷有所不同，並不是因為它隱藏着一種幽靈般的實體；而是因為它是一個可以組織起有意義的規劃的中心。與它們不同，它是創造性的。如果我們有一種可以充分抓住身體創造性的語言，那麼我們可能根本不需要靈魂的話題。”^②感覺、思想、意識都屬於身體的組織結構，沒有什麼神秘之物在使用身體：“如果我的身體是我使用或者擁有的某種東西，類似於一把開罐器，那麼可以想見，我需要在這個身體裏還有另外一個身體，以便使用這個身體，這樣無窮後退下去。”^③改造世界的的身體需要使用工具和符號，但兩者都屬於身體的活動體系；其一，工具體系（技術）是“我們身體的延伸”^④；其二，“身體自己是一種符號，在其中，是我們在場而非意義在詞語中在場”^⑤。是身體擁有技術和語言，並成爲一種文化存在。由於意識不到文化對身體的歸屬關係，人們的理論建構往往遺忘了身體。這是一種具有荒誕意味的遺忘：人們不知道自己是誰、從哪裏來、又到哪裏去，只剩下空幻的沒來由的文化自豪感。於是，“人的身體被從中間分裂開來，創傷性地分割爲畜生般的物質主義以及變幻莫測的理想主義，要麼太缺乏理想，要麼太異想天開，要麼與骨骼分離，要麼膨脹爲墮落的情欲”^⑥。要克服這個錯誤，必須承認人與身體的同一性：“如果靈魂話語（soul discourse）要被身體話語所代替，那麼，人們可以看出重要的一點是，減少談論‘有’一個身體，代之以談論‘是’一個身體。”^⑦身體不是人們的擁有物，而是人們之所是。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是身體與身體之間的關係。正是通過身體與身體的複雜交互作用，“我們纔成爲現在的我們”。^⑧在相互作用的過程中，每個“身體—主體”都向他人顯現爲物質客體，但這種特性並非其根本特徵，而是其獲得更大創造性的條件。從這個角度看，客體性不過是身體的多元形貌之一：“作爲生產者的主體和作爲消費者的主體，勁頭十足的自我授權的主體和懶散的自我偏離的主體，會在同一身體中不協調地混合起來。”^⑨作爲主體，身體同時擁有感性和理性，無須刻意去彌補二者的“分裂”。儘管存在對立和異化，實踐着的身體永遠不會被抽空。它充實、主動、生機勃勃，站在過去和未來之間，擁有屬於自己的世界，是絕對的基礎和中心。包括《李爾王》在內的文本揭示了這個事實。爲了觸及此類作品的內核，人們就必須回到“身體—主體”。於是，文本展示了其修正性力量，理論則暴露了自己遺忘“身體—主體”後的空虛。

通過借鑒馬克思和梅洛-龐蒂的相應論述，伊格爾頓重建了身體的主體形貌，並試圖將“身體—主體”定位爲理論研究的出發點和歸宿。在西方學術界，這是迄今爲止仍未獲得充分估價的重要貢獻。祇有領受其中的創造性思路，《理論之後》所蘊涵的深層綫索纔能被帶入澄明之中。

綜上所述，經過長達數十年的梳理，伊格爾頓完成了三個相輔相成的工作：一是指出人們對“身體—主體”的遺忘切斷了理論與本源的聯繫，使相應的理論建構異化爲凌空蹈虛的語言遊戲，由此產生的巨大陰影橫互在學者和文本之間；二是強調這種遺忘源於勞動分工所造就的精神/物質二分法，反映了被精心偽裝的統治邏輯；三是演繹了理論建構回歸“身體—主體”的可能路徑。通過這三個層面的思考，他敞開了一條重要的理論綫索——人們完全可以既從“身體—主體”出發，又不重蹈自然主義、生理主義、感覺經驗主義、機械唯物主義的覆轍，推動理論研究走上歸家之旅。在他略顯散漫的言說中，一種“理論之後”的理論研究綱領已經大體成型。對於正在尋找理論創新路徑的中國學者來說，可能會具有某種啓迪意義。

①②③⑦⑨ Terry Eagleton, *The Illusion of Postmodernism*, 68, 68, 70, 70, 20.

④ 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156.

⑤ Terry Eagleton, *The Sweet Violence*, xv.

⑥ [英]特里·伊格爾頓：《審美意識形態》，第196頁。

⑧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141.